

18.06

湘陰文史資料

第五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湘陰縣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410560

湘 阴 文 史 资 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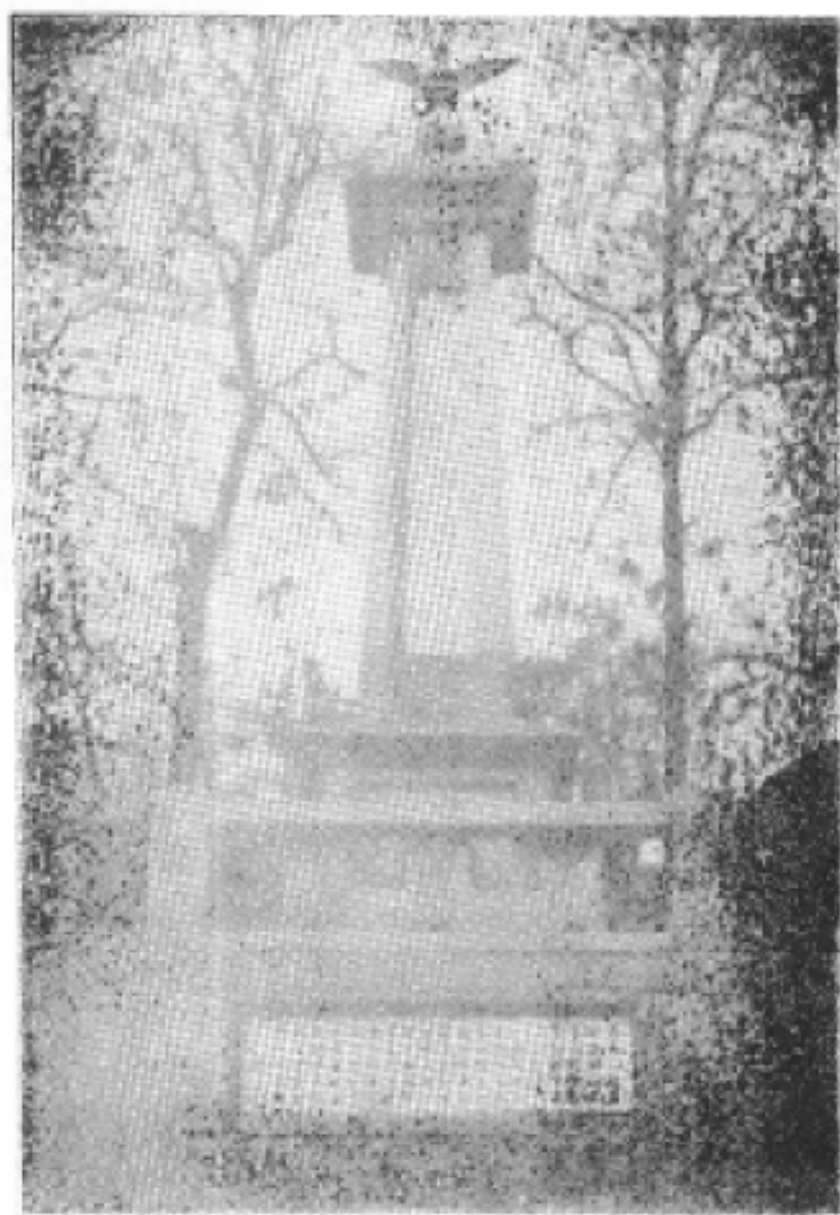
第 五 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湘阴县委员会
文 史 资 料 研 究 委 员 会 编

一九九二年三月

主 编:  蔡佳海 吴果迟
审 稿: 李仕学 凌庆麋 伏煌曙
巢剑平
封面题字: 刘恪山



任弼时同志纪念塔

摄影：郭有为

紀念塔部份題詞

攝影：郭有為



目 录

烈士纪念塔修建始末·····	张师尧	(1)
难忘的岁月·····	余泽俊	(5)
参加“暂九团”前后·····	彭子朝	(17)
夕阳如火话平生·····	胡锡龙、周介龙	(23)
“牛奶浆热”始末·····		(36)
中央“三整”工作队在湘阴·····	刘新煌	(39)
毛主席派来的医疗队·····	刘叔凡	(47)
漫米塘抢粮案始末·····	徐庆云 熊荃松	(50)
忆湘阴县秋征试点工作组·····	龙世济	(53)
忆火花工作队·····	李仲喜	(57)
湘阴“镇高”的新生·····	杨寿祺	(64)
忆湘阴县第一期小学教师学习班·····	万是依	(69)
在遭受九级风暴突袭之后·····	余泽俊	(71)
1952年酬塘、蓼矶溃垸目睹记·····	蔡佳儒	(83)
救灾、治湖琐记·····	余泳渚	(86)
蛟塘洼抢险所见·····	刘培珍	(91)
1954年湘资垸防汛抢险回忆·····	丰应龙	(94)
城西垸防汛救灾亲历记·····	万是依	(102)
杨林寨溃决、堵口记事·····	巢剑平	(107)
1983年湘阴龙卷风灾见闻·····	钟章云	(112)

民国时期湘阴的买办企业·····	徐庆云 熊荃松	(117)
德润生绸庄的兴衰·····	杨寿祺	(120)
刘人和祥的经营特点·····	刘季云	(125)
湘阴食锦续编·····	刘季云	(129)
罗城杂忆·····	王九思	(132)
关于陈佩玖之死·····	颜震潮	(137)
湘阴县议会第二次临时会议报告书及祝辞·····		
·····	程联辉录	(140)
湘阴县县名、县治初考·····	钟章云 张可夫	(144)

烈士纪念塔修建始末

张 师 尧

1950年5月，我从湘潭军政干校学习结束后分来湘阴县民政科工作，当时的科长是张建邦同志，主办科员是兰良燕，科员有刘荣中、吴健、徐蕴珩和我等。

到民政科不久，省民政厅下达了一个文件，称：我县（含今汨罗市）是革命老根据地，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涌现出了不少革命志士、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要切实做好优抚工作，主要是做好对革命烈士的褒扬及其家属的抚恤和安置工作。在科务会议上，按照省民政厅的文件精神，作了具体分工：兰良燕负责调查落实、审核、报批全县烈士和烈属情况；我负责接待烈、军属来访和优抚、安置、救济等事项。张建邦同志还提议修建一座革命烈士纪念陵园（或碑亭）。会议就此事议论了一番，并就地址的选择提出了三个方案：一是在八甲前面的白骨塔旧址重修；二是在三井头修一纪念碑；三是在圣宫坪（现集贸市场）修一纪念碑。会后张科长向史杰县长作了汇报，史县长欣然同意，并指示约定彭国枚、任永骏及邹培泽、刘亮凯等人选择哪天去实地察看。几天后，张科长约同上述人员去了八甲白骨塔山上，我与兰也同去了。这次只看了一下，未作定论。后来由于筹备土改训练班，紧接着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开始了，

机关里的大部分人员都参加了土改，我也去了，这事也就被搁置下来。

1950年10月，任弼时同志逝世。这年冬，我从土改队奉调回民政科搞办公室工作。这时，又接到了省民政厅转发的中央文件，文中指示，我县是任弼时同志的故乡，可建立一个纪念物。我将文件精神转告了张科长，张科长说，可以考虑建一个规模较大点的纪念碑，他准备在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一个提案提出来交大会通过。会议筹备期间，张是筹委会负责人之一，我是秘书处工作人员。张要我起草三个提案：一、由史杰同志提议修建人民大礼堂；二、由彭国枚、任永骏同志提议修建县人民政府办公楼（有部分领导同志不同意建办公楼，张科长面示改为修建大会宿舍）；三、由张建邦同志提议修建革命烈士纪念塔（任弼时纪念塔）。这三个提案后来被一致通过，这便成为了湘阴解放后的第一个三大建筑。这三项工程的总投资开始是确定15亿（旧币）元，后又增加2亿，共花17亿元才竣工。

这三大建筑是由邹培泽、刘亮凯两人设计，由衙正街的夏桂记营造厂承建的。在设计纪念塔时，史杰、张建邦、彭国枚等同志从造型方案的选择、审核定稿到塔址的确定，都亲自过问，操心最多。塔址最后定在圣庙状元桥前（当时的状元桥已在抗战时期被日寇炸坏）。建塔的材料，从节约投资出发找了一些窍门，如石料，就将一座已经倒塌的鼓楼和摇摇欲坠的钟楼以及旧儒学堂的石料全部利用，大成殿前面左右两边有两块无字石碑，是两块大汉白玉石料，也利用了。最后白玉石仍少了，就将圣庙围墙上的两块大汉白玉石（刻有“官员人等至此下马”）也拿来利用了。

当时，我们这些经办人都还没有办过什么大事，所以破土动工时未搞什么奠基剪彩仪式。

开工后，我就忙于找人书写碑文、题词等。曾先后到湖南大学、省政府参事室等处请柳敏泉、仇硕夫、甘融等先生写了主碑文。他们虽是一手好字，可回到机关呈各位领导品评时均以各有所短未被采用。当时，在场的县政府文印室的甘菊祥同志说，他在粮食局工作的舅父蒋凤仪写得一手好字。史杰同志听后，即找了粮食局樊川廷局长，要将蒋调来书写。第二天上午，蒋来到县政府办公室，当众泼墨挥毫，果然一手好翰墨，赢得了众在场者的啧啧称赞。

塔主体碑前后方碑文“为人民解放事业牺牲的烈士精神不死”、“中国人民的伟大战士和政治家任弼时同志永垂不朽！”由我拟就，史杰同志批准后，蒋凤仪同志工笔书写，主碑东侧的任弼时同志传略，由县委宣传部供稿，蒋先生书写，西侧序言，由兰良燕同志撰文，蒋凤仪同志书写。塔基前方有县委书记华国锋同志的亲笔题词：“为我人民事，牺牲生命和家，继承先烈志，建设新中华”和史杰同志题词，

“为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而牺牲的英雄们的模范事迹将在我们和我们后代的记忆中永垂不朽，让我们学习他们，把生命同样无保留地献给人民民主事业和伟大的祖国”由蒋凤仪同志拓石。碑基前方是省主席王首道的题词：“为人民解放事业而英勇牺牲的死难烈士永垂不朽！”东西两侧有当时的长沙地委书记武光和张千承同志的题词，“中华儿女的楷模”，“党的模范，人民的光荣，后辈的表率”。均由我丹笔拓石。碑基后方刻有陈毅安、余革等烈士的简介。

整个工程历时半年，于1951年5月竣工，由史县长、

张、彭两科长验收。竣工没有举行什么仪式，由我请了“时时有”照像馆的师傅照了几张相片，存档备录。

纪念塔整个工程完成后，我们将全部照片（共八张）加洗了八套，分别寄给了国务院和任弼时的夫人陈琼英、陈毅安的夫人李志强、黄文阁烈士的小妹妹黄静汶等人。他们接到照片后，均来信表示感谢，陈琼英同志还寄来了5枚任弼时同志的像章，因要的人多，写信给她，后又寄来了12枚。黄静汶同志还请黄文阁生前的老战友宋时轮将军向湘阴县人民政府写了一封信，信中介绍了黄文阁烈士在洪湖战役中牺牲前后的情况，并就建塔一事表示感谢。

湘阴县烈士纪念塔虽称不上规模宏大，但在当时以建纪念塔方式来纪念革命烈士在全省来说还是走在前列的。在全省、地的民政工作会议上得到了肯定。

张师尧系退休老师。

难忘的岁月

余泽俊

建院学习

1949年7月20日，岳阳解放。为了解决新区急需干部的问题，长沙地委在这里创办湘北建设学院。

我家住农村，家境困难，初中只读了年半就辍学务农。看到湘北建设学院招生的广告，于是报了名。

当时“建院”的考试，除一般历史、地理常识和对世界重大事件的看法（如是谁打得日本投降的），还要谈报考“建院”的认识。

谈认识，我一个农村青年，懂得不多，只是记得在学校时，老师教我们唱过一首歌，歌词大意是：“……前进，中国的青年；挺战，中国的青年，中国恰象暴风雨中的破船，我们要认清今日的危殆……”我那时很喜欢这首歌，唱着这歌，对照国民党统治下暗无天日的现实，激起了我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忧患意识。当时，我就是凭着自己仅有的一点模糊的、朴素的认识，作了这份答卷，认识不深也还是过了关。

7月下旬的一天，我背着一床又旧又薄的棉被、一套换洗的单衣、一只破烂的铜盆，和几个本地同被录取的青年，顶着烈日，冒着酷暑，步行60多里到岳阳城乾明寺报到。报

到时，其他几个青年都很顺利地上了名册，轮到我时，负责报到的同志打量了一番，在给我的那张报到通知单上写道：“因年龄、身材太小，不便收录。”当时我确实还不满16岁，怕不能录取，在报考时，填报了18岁。

一见这情形，我急得哭了。

这时，同来的几个年龄大的伙伴毕竟成熟些，他们带我去找当时湘北建设学院的教务长毛华初同志，实事求是讲了自己的年龄，讲了家里的困难，表示了自己参加学习的决心。

毛华初同志看到这种情况，说：“湖滨那里年纪小的多，你就去那里报到吧！”

听了他这句话，我才破涕为笑，兴冲冲赶到湖滨，在那里很顺利地上了六大队的名册。果然，这里的学员，有不少是和我年龄、身材不相上下的小青年。

湘北建设学院当时编有7个大队，每个大队有百把人左右。一至五大队在岳阳城内，六、七大队在湖滨。湖滨离岳阳城有10多里路，位于洞庭湖滨，风景优美。过去，美国人在这里办过教会学校，有几幢破旧的房子。我们这两个大队就驻在这里。当时条件相当简陋，吃的粮食、开铺的地板、用的教具，都是干部和学员从城内用板车拖来。开始吃的是小米，开餐的时候，炊事员用大铁锅或水桶装着，摆在露天里，没有定量，吃多少装多少。我和不少同学很不习惯，怎么也吃不下，打了不少饿肚。后来改吃糙米，相比之下倒是觉得很有味道。睡的是地板统铺，十几个人挤在一处。那时，大队的领导张丕霖、关键、周克等都是南下同志，年龄比我们大，生活上和我们打成一片，可亲可近，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共产党的“官”和国民党的“官”有天壤之别。

学习期间，有少数学员受坏人煽动，加之生活艰苦，经不起考验，开了小差。但大多数学员认定跟共产党走没有错，坚持下来了。

两个多月时间（前期在湖滨，后期转到岳阳城内县立中学），尽管学习条件差，为避敌机骚扰，有时还要移到附近树林里上课，但同学们的学习情绪始终饱满。上课，全神贯注听，作记录；讨论，认真思考，积极发言，还写了不少学习心得。我们先后学完了《社会发展史》和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这些内容对我来说是那么新鲜，使我懂得了很多道理，深刻认识到，中国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三座大山，人民当家作主，才有出路。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那天，也是我们学习结束的日子。我们学院的全体学员参加了在岳阳楼附近一个大操场里举行的庆祝大会。地委的一位领导同志在大会上讲了解放战争的形势，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伟大意义，讲了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任务。

那天参加大会的有好几千人，驻军在大会会场的周围架起了好几门高射炮。当时衡阳还没有解放，敌机从那边不断地飞来，但不敢进入会场上空，只在会场外的上空转了几圈，向洞庭湖里投了几颗炸弹，就飞跑了。在这期间，会场秩序井然，与会人员屹立未动，对敌机的骚扰嗤之以鼻。

开 赴 湘 阴

学习结束，即将走上工作岗位，这时候，我和大多数同学在高兴的同时，又有些担心，要远离家乡，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工作，自己能干什么呢？

领导好象看出了大家的顾虑，出发前开了会，作了动员，特别强调了每个学员应具有崇高的革命精神，要向革命先烈和英雄人物学习，不能怕苦、怕死。工作中要多向老干部请教，不懂就问；要相信和依靠群众，在实际中增长才干，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领导的话，鼓舞和鞭策了我，使我树立了信心，振奋了精神。

那时，因为铁路被敌人破坏，我们到湘阴是从水上出发的。10月5日傍晚，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背着行李，和同学们一道，上了拖轮拖带的驳船。分配到长沙、湘潭等地去的同学都是这一路。那天正是农历八月十四日，在明亮月光下，拖轮缓缓而行。坐在几条驳船上的同学们，都是激情满怀，唱着在学习时学会的“走，跟着毛泽东走”、“你是灯塔”、“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团结就是力量”等革命歌曲，歌声此起彼伏。拖轮行驶到磊石山已经天亮了。为防敌机空袭，船停下来，大部分同学上了磊石山。磊石山没有树木，只有满山的石头。同学们三五成群围坐在石头上，谈谈笑笑，猜测着刚刚解放的农村形势，议论着即将参加的清匪反霸、筹粮支前、减租退押、土地改革，交谈着各自的打算。傍晚时分，再上驳船，第二天拂晓抵达湘阴县城。

我们六大队70多个同学由周克同志带领，上岸后就到大成殿，在那里休息，听候县委的安排。不一会，县委负责同志接见了我们，讲了些鼓励的话，就安排工作。当时全县分

4个办事处和城关镇。我们这个分队有近20人，由彭泽滋同志带领，分乘几只小划子，去临资口河西办事处报到。河西办事处就设在一座两层小楼房的基督教教堂内。办事处主任李良秀、副主任解清泉接见了我们，介绍了湖区的情况和工作任务。

那时，新的区、乡政权还未建立。整个工作是在办事处领导下，组成工作组，由南下干部带领开展活动。刚刚解放，干部人数少，加之人生地不熟，为有利于工作的开展，还是利用了旧时的乡长、保长。

筹 粮 支 前

彭泽滋、郭重奇、胡静安等我们几个同学分到文洲乡，由南下干部李树发同志带领。下去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搞好借粮、秋征，支援前线。

当时，文洲乡一带大股土匪万寿鼎部刚刚被打垮，零散的土匪仍然存在，他们昼伏夜出，进行骚扰。肃清这些残匪的任务主要由驻扎在茶湖潭的武装中队担负。

为了防御残匪的突然袭击，我们工作组六、七个人，配有1条短枪，两条长枪，并且常常一个晚上挪两、三个地方休息，睡觉时还得有人站岗放哨。

工作组时合时分，有段时间，我驻四保，也就是乔口对河。保长叫陈生国。这是个20多岁的年轻人，解放前毕业于“楚怡高工”，在当地一所养正学校当校长。刚刚解放时，前任保长由于在送一船公粮到湘阴县城的途中沉船，公粮损失殆尽而被撤掉，经保民代表会，公推陈生国当保长。开始，陈生国不肯接任，经南下干部、河西办事处武装股长陈

欢迎同志做工作，他才上任。

他一上任，就带头完成了2600斤借粮任务，然后再开会做群众工作。有他的带头示范，这个保在全乡率先完成二十四万多斤粮食和十七万多斤柴草入库任务。

与此相反的是文洲乡乡长袁仲祺。我们从表面上看他似乎还老实，实际上，他是个阳奉阴违、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时刻伺机破坏的家伙。正在粮食入库时，他派人在晚上去找四保保长陈生国，要他上交保费。当遭到了陈的拒绝后，他又勾结十九保保长，煽动3000余人，到位于四保的国家仓库抢粮。当时住在这个仓库里的除有国家干部外，还由四保每晚派两个可靠的农民值班守护。当成群结队担着箩筐的人出现在仓库附近时，马上被守护人员发现，当即鸣锣报警，一下子招来四保100多人护仓，来抢粮的人虽多，毕竟绝大多数群众是受蒙蔽而来。经过宣传，晓以利害，都各自散去。公粮终于未受损失，袁仲祺的阴谋也就未能得逞。

事后，通过调查，弄清了事实真相，加上其它罪行，袁仲祺被判处死刑。

在1950年建立区、乡、村新政权前，我和工作组的同志们一直没日没夜地在文洲乡的各个保转来转去。尽管当时情况是那样复杂，工作是那样辛苦，待遇又是那样差——实行低标准供给制，每月45斤米，在群众家吃一餐饭交半斤米票，如果不交或少交，发现了要作检查；穿的是统一发的一套毛兰色棉衣，两套灰色单衣和一套绒衣绒裤，没穿多久，兰色变成了暗红色，灰色变成了白色，但是谁也不嫌它差，觉得制服越旧越革命，穿在身上还有种自豪感。

1950年2月下旬，县委召开扩干会。我接到通知之日，